

么，就在于他和它拥有只有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，由此他们具有了自身不可替代、无法被遮蔽和篡改的质的规定性。

那么在今天，一个作家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？

这些年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，我越发感受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日益融合，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的前所未有的力度。我们努力在自己与世界文学之间求取一个“最大公约数”。有此努力的不仅中国文学，日本文学也在努力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都在努力。我们正在无限逼近歌德在1827年提出的那个“世界文学”的概念。这当然很好。但随着全球化势如潮涌，尤其新世纪以来，世界文学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趋同，文学的同质化。

文学的同质化源于生活的同质化。科技、交通、资讯尤其网络的发展，让浩瀚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彼此依存、相互知根知底的地球村。你知我、我知你的生活让写作变得趋同。趋同当然自有其必要性，大家达成共识的交集更大，相互间的最大公约数更大，理解和交流的前提更充分，但同时也面临一个更大的风险，就是彼此取代：你知道的他也知道，如果我只需要一种信息源，那对不起，你有二分之一的可能靠边站。即使AI、ChatGPT没出世，因为写作的同质化，作家也必定会相互取代，现在又来了一条速度更快的叫ChatGPT的狗在屁股后头追，作家的日子变得前所未有之难。这就逼着写作者不仅要区别于作为同类的同行，还要区别于作为另类的“同行”。

对一个写作者来说，区别于他人之后，方可自我确立。这个区别，在作家个体之间需要，在作家群体之间同样需要。就我的理解，作为群体的作家，比如中国作家，

比如日本作家，相互区别的根本可能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和传统。这些是流淌在我们血管中的无法混淆与同质化的基因，决定了我们今天分别是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，决定了我们的作品分别是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。

多年前读到中国老作家汪曾祺先生的一句话，是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告诫年轻人的：“我觉得新潮派的年轻作家，要补两门课，一门课是古典文学的课，一门课是民间文学。”那时候读没感觉，今天重读，觉得切中时弊也切中时需。老先生那个时候就意识到，一个作家只有深入到中国的“传统”和“民间”，才能具备长久的、可持续的创造力。他本人的写作也印证了这一点。五十八岁那年，汪先生开始进入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，而很多作家到了这个年龄，创造力多半已经大大萎缩，准备去写回忆录了。悠久的传统和广大的民间塑造了我们。当一个作家有能力溯流而上，与老祖宗接上头，或者有能力对老祖宗的资源与遗产作有效的现代转化，那么，他将获得支持他创造的绵延不绝、汨汨滔滔的源头活水。

一个作家如是，一个国家的作家、一种文化范畴中的作家亦当如是。所谓来龙去脉，有“来龙”方有“去脉”。实现了这种贯通，我们才会成为那“是其所是”的写作者；这种贯通的能力，也决定了我们最终是否能够成为区别于他人、拥有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差异性的作家。这种贯通的能力，依赖单方面输入的小冰没有，阿尔法狗没有，ChatGPT也不会有。拥有这种能力的作家，一定也是身后的各种AI狗都追不上的幸运者。

2023/9/21，远大园

（作者简介：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、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等）